

“软制衡”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实证分析*

谢立忱 齐淑杰

内容提要 “软制衡”，是因应冷战后针对美国的“硬制衡”的明显缺位或不足，而于21世纪初开始频现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新概念。作为传统制衡行为的变种，“软制衡”有着明显区别于“硬制衡”的战略目标、理论逻辑和机制。次等大国之所以对美国采取“软制衡”战略，主要在于单极结构压力与制衡的实力“门槛”与美国霸权合法性的下降、应对“硬制衡”的难题与实力性质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内部要素与互动属性的变更等五方面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的战略协调与外交合作，便是反对美国的典型“软制衡”实例。

关键词 “软制衡” 大国 美国 叙利亚危机

作者简介 谢立忱，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临汾 041004）；齐淑杰，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秘书（临汾 041004）。

根据传统的均势理论，冷战后美国自身显著的权力优势，尤其是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极具单边主义色彩的国家战略，似可导致其他大国针对美国的典型制衡行为（结盟或军备竞赛）的发生。然而，这种现象并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均势理论的焦点由防范霸权变为应对霸权，由侧重研究均势状态这种国际结果转向了研究制衡这种国家行为。^① 尽管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

* 本文得到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亚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因素”（2012322）资助。

① 参见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3页。

大国，美国没有遭遇传统的外部制衡（缔结联盟），但也屡受制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也为了解决在新国际政治现实下传统均势论自身的退化问题，“软制衡”论应运而生。

何为“软制衡”？

“软制衡”，是因应冷战后针对美国的“硬制衡”的明显缺位或不足，而于 21 世纪初开始频现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新概念。“软制衡”是传统的制衡行为的变种：与传统“硬制衡”要努力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不同，“软制衡”有着较低的期望值，主要致力于增加强国行动的代价。也许正因为“软制衡”的目标存在较少野心，从而使其成为次等大国尤为青睐的外交政策工具。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的解释，“软制衡”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即通过国际制度、经济策略、严守中立等非军事手段拖延、阻挠和破坏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而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①佩普强调，由于单极体系下制衡美国的实力门槛高、直接挑战美国权力的制衡成本和风险大，次等大国通过传统方式也无法解决集体行动的协调问题，因而这些大国可能采取“软制衡”手段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在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实现“软制衡”。在佩普看来，制衡唯一超级大国的逻辑是协调次等大国采取集体行动的预期，而“软制衡”有助于汇聚期望、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②佩普还认为，如果美国不约束自己的单边行为，“软制衡”的强度会逐渐增大，甚至可能演变为“硬制衡”。^③当然，佩普也指出，受各种因素的限制，“硬制衡”是否会在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发生，尚难预测。^④这是因为各国并非始终致力于追求本国军事力量的最大化或谋求世界第一军事强国。^⑤

①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10.

② Ibid., pp. 17 – 18.

③ Ibid., p. 18.

④ See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

⑤ Ibid.

“软制衡”论的另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保罗（T. V. Paul）对“软制衡”的解释与佩普的界定类似，即在后冷战时代，在不损害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情况下，次等大国日益倾向诉诸“软制衡”战略以抗击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单边趋向。^① 保罗是从宽泛的意义上界定“软制衡”的内涵，将这种制衡行为视作旨在限制美国权力的制度或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② “软制衡”作为一种战略，例如通过外交协作，特别是利用联合国舞台，既可以约束美国权力，又不会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

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观点，“软制衡”战略并不寻求或期望改变能力的总体分配。^③ 相反，它接受现状，但试图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好的结果。因此，在美国主导下的当今世界，“软制衡”战略是出于获得同美国偏好相反的结果而有意识地协调外交行为，但这取决于制衡方能够彼此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当一些国家试图约束美国权力，且确信别的国家也会这样做时，更可能产生“软制衡”。因此，成功的“软制衡”实际上是自我强化之举，即他国越是对美国权力与政策表示担忧，且这样的国家越多，它们联合遏制美国行动的愿望便越强烈。^④ 所以，沃尔特警告道，今日成功之“软制衡”可能成为明日大变革之基础。^⑤ 如果其他国家为了增大美国采取行动的代价或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实现政策的协调，那么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其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他人的能力均将受到削弱，从而为未来能够从根本上挑战美国权力奠定基础。沃尔特认为，“软制衡”作为反对美国的一种战略，旨在达到这样几个目标：一是增强制衡方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二是提升制衡国家在全球谈判中的谈判地位；三是外交上“先礼后兵”；四是实现两面下注。^⑥

综合分析现有的“软制衡”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软制衡”论的倡导者倾向于将“软制衡”描述成是通过采取某些策略或手段间接对抗霸权

①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70.

② Ibid., pp. 58 – 59.

③ Mordechai Chaziza,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Chinese and Russian Veto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Syria Crisis”, *China Report*, Vol. 50, No. 3, 2014, p. 246.

④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郭盛、王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⑤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46.

⑥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前引书，第107~108页。

国利益或权力的一种战略^①，并不同程度强调了“软制衡”有别于“硬制衡”的几个鲜明特征。第一，“软制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区战略，即旨在削弱美国在同其他大国相邻的地区的影响力的一种战略。地区主义是“软制衡”的一个核心方面，因为主要大国不必令自己在体系层次直接挑战美国。第二，规范在“软制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所承认的，有些国家可能视某些观念是具有威胁和破坏性的。^②因此，制衡思想或观念具有理论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意义。在霸权体系下，规范能够像陆军或海军一样对某些国家产生威胁，影响这些国家获得自己的利益。^③从理论上讲，“软制衡”遵从体系逻辑。在多极体系下，由于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因而结盟对象的选择余地大，制衡联盟可获性高。在两极体系下，两个“极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实力相对较弱，因而联盟的制衡效果大打折扣，某一阵营内部成员国的变节行为对整个体系均势的影响是很小的。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或超级大国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那些与它实力最为接近的竞争国，导致传统的内部制衡（加强军备）和外部制衡很难起效。有鉴于此，主要大国要制衡单极国家，就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实质上这些策略往往是规范性的。第三，利用非军事手段，意在削弱、限制而非直接对抗霸权。传统的“硬制衡”主要通过加强军备、缔结作战联盟、向盟友转让军事技术等方式，寻求改变现实的，更多是潜在的冲突中的军事力量对比，进而达到势力均衡。“软制衡”则在不直接挑战美国优势权力的情况下，利用非军事手段拖延、阻挠美国对权力的使用，或者增大美国使用权力的代价，从而实现对美国的一定制衡，以至为最终实现均势奠定基础。

从总体上看，“软制衡”论者主要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与那种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传统‘均势’论失效”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制衡战略事实上已经出现。“软制衡”论的支持者坚称，在当前新的国际体系结构下，均势的动力仍起作用，但制衡的逻辑发生了改变。^④他们同时强调指出，体系中实力分布的失衡并不意味着各国已从总体战略上放弃进行制衡，因为制衡并非一直

① See Chaka Ferguson, “The Strategic Use of Soft Balancing: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 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5, No. 2, April 2012, p. 202.

② Ibid., p. 207.

③ Ibid., p. 204.

④ See Chaka Ferguson, op. cit., p. 202.

是一种成功的政策。^①而且，在当前单边主义盛行的世界体系中，成功制衡一个现实的霸权国需要采用新的策略。

总之，在当前国际体系下，“软制衡”是次等大国应对美国优势权力或霸权企图的重要甚至主导行为倾向，且在制衡手段、目标及逻辑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硬制衡”。

为何“软制衡”？

“软制衡”正取代传统的“硬制衡”，成为次等大国应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或主导行为。那么，这些大国为何要制衡美国？为什么是“软制衡”，而不是其他战略？

（一）单极结构压力与制衡的实力“门槛”

根据均势理论的逻辑，实力分布失衡的程度与国家面临的生存和安全压力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而实力分布严重失衡的单极结构使得国际体系内的二流大国，尤其是潜在制衡者面临的这种结构压力更大，因为它们往往是霸权国进行打压的重点对象。而按照均势理论的预测，各国通常会制衡最强大的国家。^②因此，一般来讲，这些潜在制衡者的制衡动机自然更强一些，但往往囿于制衡本身过高的实力“门槛”（Threshold）。因而，伴随21世纪以来美国因反恐、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而导致的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继续推行，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制衡美国的动机和能力也逐渐增大。

（二）美国霸权合法性的下降

自冷战结束到小布什主义的出台，这段时间找不到美国遭到制衡的明显证据，也不存在次等大国彼此推卸制衡责任的显著迹象。^③如果说该时期存有任何针对美国的制衡的话，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发生主要大国增加军费开支或反对美国动用武力（直接或间接）等制衡现象。^④这显然不符合

^① Chaka Ferguson, op. cit., p. 202.

^② See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 – Balance: Self – Restrai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4.

^③ See Robert A. Pape, op. cit., pp. 20 – 21.

^④ Ibid., p. 21.

“国家制衡优势权力或主导国家”这一通则。对此，一些国际政治学者纷纷进行了自己的解读。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相对来讲，冷战后这种制衡行为一度缺位或不足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美国作为所谓“仁慈的霸权”形象和声望或者说是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合法性之所以重要，因为当外国精英乃至民众认为美国的优势地位及行为总体上是有益的、正当的，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喜欢美国，追随美国，制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便会较小。与之相反，当美国及其行为被负面看待，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不友善的、有违道德标准的，则会导致更多的人和国家恐惧、怨恨美国的主导地位，“选举的毒药”甚至使那些想支持美国政策的外国精英也望而却步，因而制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同时，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合法性直接影响次等大国对美国行为动机的认知和风险的判断，进而影响这些大国对美国的制衡动机。一般来讲，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的正当性程度与次等大国的制衡强度成反比。^① 霸权国的良性行为会减少对次等大国核心利益的冲击，增加其正当性，从而减弱次等大国的制衡倾向，反之亦然。

因此，自小布什上台以来，制衡（内部制衡和“软制衡”）复苏与美国首要地位合法性的下降密切相关。根据 2002 年公布的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有权对所谓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自己的军事主宰地位。^②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和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便是该战略的具体体现。尽管这些军事政策对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全球权力地位影响不大，但却会改变其他国家对美国使用权力意图的看法，导致美国的“仁慈的超级大国”国际形象受损，削弱美国对制衡的免疫力。例如，美国在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有违国际社会“反对将预防性战争^③作为合法的政策工具使用”的规范，导致美国软实力严重受损、合法性骤然下降^④。伊拉克战争结束后，19 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近 2/3 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美国印象不佳。^⑤ 应该说，先发制人并非新鲜事物，在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但直

① 刘丰：《制衡的逻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5 页。

② Robert A. Pape, *op. cit.*, p. 21.

③ 这场战争并非基于应对迫在眉睫的明显威胁这一先发制人合法化的条件，因而属于典型的预防性战争。See Robert A. Pape, *op. cit.*, pp. 27 - 28.

④ *Ibid.*, pp. 25 - 26.

⑤ [美国]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9 页。

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从来没有为征服一个主权国家而发动一场典型的预防性战争。而且,小布什政府试图将先发制人合法化作为美国的一种“正常”的战略手段。作为一种结果,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既然已经对伊拉克实施了先发制人战略,也可能对自己采用这一战略。显然,这些国家主要关心的不是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而是方式,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为实现目标愿意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根据均势理论,其他主要大国会努力限制美国以单边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权力。^①

与其他国际体系相比,单极体系下次等大国可能更为担忧来自霸权国的间接威胁,更加关注霸权国的行为动机,因为霸权国已经比任何一个次等大国都要强大,唯一超级大国的压倒性权力使得其他大国对其进攻意图的认知倘若发生轻微的改变,就可能导致这些大国对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明显担忧。的确,相对多极世界中的大国来讲,判定唯一超级大国的进攻意图的门槛要低,因为唯一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霸权的能力是给定的。因此,这个超级大国采取的单边政策或行为仅仅出于加强对某些小国的控制或只获得了很少的权力收益,都可能被认为是富有进攻性的,因为这些单边行为意味着超级大国的动机发生了改变,即独自获益,并可能以其他大国的损失为代价。假如美国的行为方式对一些国家形成了威胁,它们谋求制衡(即便仅以试探与隐蔽的方式)美国的可能性便会增大。^②小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典型的先发制人特点,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单边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战略。然而,这种完全抛弃美国曾长期参与缔造、奠定其与其他大国关系基础的国际制度、条约与协议^③,且忽视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和主流规范的做法,从实际效果看,美国一味追求自身绝对霸权与行动自由的单边主义战略注定一再遭受挫折,并导致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空前高涨,削弱了自身合法性,进而增大国际社会包括次等大国对美国权力的担忧及制衡美国的动机。尽管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的单边色彩变淡,转而向多边主义回归,但这并未改变美国国家战略的本质,也不代表美国已彻底与单边主义分道扬镳。因为单边主义既是美

^① See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 – Balance: Self – Restrai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op. cit., p. 125.

^②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 – Balance: Self – Restrai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op. cit., p. 153.

^③ 刘丰:前引书,第218页。

国外交的一种传统，也是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一种手段。例如，201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我们将原则性地、有选择地动用武力，武力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但有时却成为必要选择。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单方面使用武力”。^①而且，美国要修复伊拉克战争以来严重受损的对外形象、增强自身合法性，绝非朝夕之功。

（三）应对“硬制衡”的难题

在当前国际体系下，由于安全上受到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次等大国与多级体系下的主要大国一样具有较强烈的制衡更强大国家的动机，但制衡采取的形式和遵从的体系规则却有所不同。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以往多极或两极体系中起作用的“硬制衡”（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已很难起效或成为一种难题。

首先，反对唯一的超级大国，主要通过加强军备的内部制衡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因为最起码在短期内，美国的绝对权力优势使得单个国家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权力平衡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某一国家的内部制衡行为存在遭到美国集中打击的高风险，因而很少有国家会这样做。

其次，在霸权主义盛行的国际体系下，制衡一个超级大国的任务不能由单个国家实现，而只能由多国集体完成，即采取外部制衡。然而，在此国际环境中，主导国家的压倒性权力及很多国家选择追随主导国家的战略，成为形成有效的制衡联盟的严重障碍。这样的联盟不仅要包括大多数乃至全部次等大国，且面临巨大的协调难题，需要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过，与经典集体行动理论把集体行动的困境归因于“推卸责任”或“搭便车”现象的观点不同，大国联合制衡美国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担心集体失败。因为美国的超强实力使得没有哪个大国有能力单独承担制衡的责任，因而很大程度上讲也就无便车可搭。所以，制衡唯一超级大国的逻辑实质上是一种协调博弈，确保参与者的及时合作是一个巨大难题。协调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国间汇聚期望的进程，但该进程的受阻往往会导致“硬制衡”的推迟乃至破产。而且，与具有突出军事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进行直接对抗，其结果是很可能在包括全体成员的制衡联盟组建起来以前便迅速遭到失败。鉴于此，针对唯一超级大国的“硬制衡”联盟，要么是骤然生成，要么根本无法组成，而不是渐进形成。唯一超级大国压倒性的权力优势致使次等大国倾向于推迟“硬制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February 2015, p. 8.

衡”，直到他们实现采取集体行动所必需的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国可能转而诉诸“软制衡”战略。这是因为，这种制衡战略更有助于次等大国汇聚集体行动的预期，解决协调难题，但又可以避免因实行“硬制衡”而导致的直接对抗和强烈报复。正如沃尔特所认为的，各国通常可以选择“软制衡”而非正式联盟的方式来遏制美国。^①

（四）实力性质的变化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卡尔（E. H. Carr）曾将国际实力分成三大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与影响舆论的力量。^② 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指出权力具有两张面孔，并将实力划分为巧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③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中实力的性质和构成均发生了变化，实力资源的分配在不同议题上存有较大差异。世界政治犹如一盘三维棋局，在上层、中层和下层棋盘中起关键作用的分别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因此，一国要想赢得这盘棋就得同时在水平和垂直空间里落子^④，就要运用巧实力，将硬实力与软实力巧妙结合起来，而不能将目光局限于这个三维棋局中的某一个棋盘，偏重于发展某一种实力。而且，一国要想在最下方的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气候变化等跨国议题棋盘上成为赢家，更要学会使用软实力。^⑤ 尽管受民主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实力转换尚不具有全球性，但在当前世界，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三者愈益相互关联，只不过在各自强度、所依存的关系方面存在差别而已。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伴随着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硬实力与软实力日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美国虽拥有诸多能够制造软实力的潜在资源，且是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在软实力领域并非一枝独秀，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均拥有相当的软实力。它们虽然不具备有效制衡美国的硬实力，但却可以调动自身软实力，设法抬高美国动用硬实力的代价，利用多边机制剥夺美国政策的合法性，阻碍美国实现预期目标，进而实现“软制衡”。特别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由于美国过于注重硬实力、忽视软实

① [美国] 斯蒂芬·沃尔特：前引书，第106页。

②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 - 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09.

③ [美国] 约瑟夫·奈：前引书，第8~43页。

④ 同上书，第7页。

⑤ 同上书，第7~8页。

力的单边主义行为导致其对外吸引力直线下降,其软实力大大受损,更加为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达到“以柔克刚”的目的或对美国霸权进行“软制衡”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五) 国际体系内部要素和互动属性的变动

冷战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内部要素和互动属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大国制衡美国的动机和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国际体系内部要素的变化而言,第一,国际体系结构(体系内的实力分布状态)的世界多极化与多元化进程加快。尽管美国仍占据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但随着美国因反恐、伊拉克战争等导致自身软硬实力下降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极化态势愈发明显,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开始在国际体系中分享权力和分担责任,成为新多元权力结构中一支重要力量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一股建设性力量。根据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乃至爆发霸权战争或体系战争,因为霸权国必然要进行霸权护持,而新兴大国又要修正体系^①。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当前次等大国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二者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但次等大国挑战美国的动机和几率显然也较此前相对增大,尤其当美国没有进行适当的自我克制、忽视这些大国的合法性利益诉求时,更是如此。

第二,国际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或国际观念结构两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两大体系要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伴随冷战后安全威胁性质的改变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西方建立的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日显不足,合作治理渐渐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原则,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性理念,国际社会的主流行为规范已从霸权国单边主义转向大国合作,从而与美国的单边作风发生碰撞,进而剥夺美国单边行动的国际合法性,并增大他国对美国能力的质疑、权力的担忧,以及制衡美国的动机。

在国际体系的互动属性方面,国际体系日益显现出多元和复杂的互动属性,这不仅表明美国等国际行为体正参与的是权力、制度与观念等不同领域、不同质的互动,而且意味着美国在不同层面的地位也不同。^②事实上,当今美

^① 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15页。

^② 杨少华:《评“软制衡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44页。

国在国际制度和观念等领域的地位并不像它在权力政治领域中的地位那么突出,^①且美国在这两个领域不时受到制约乃至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本身发生了变化,还在于这两个领域的国际互动具有完全不同于权力领域的属性。相对于权力领域的强制性而言,制度与观念等领域的互动更讲究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商、妥协与合作,更强调对国际体制以及多边主义的参与和运用等新的“博弈规则”。^②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背景下,军事力量的使用成本大为增大,传统硬权力固然重要,却不再是大国关系的唯一主题,大国互动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和观念等软权力层面展开。^③因此,如果说美国凭借显著的权力优势,在权力政治层面他国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制衡,那么美国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受到大国“软制衡”的可能性则较大。

用制度替代军事力量作为自己保持优势地位的手段,无疑是美国在现代历史上的一大创造。这是因为制度体系能增强一国的软实力。二战后,美国为凭借缔造国际规则与制度体系极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一国实力及行为若在他国眼中显得合理合法,那么该国达到目标的阻力就会较小,便不需要频繁地挥舞“大棒”和提供“胡萝卜”。然而,国际体系内部要素和互动属性的新变化,不仅致使美国不得不日益面对制度与观念等层面的国际互动,遵从并受制于国际互动诸多新“博弈规则”,而且导致美国遭受体系制衡的概率、大国制衡美国的动机和能力也随之增大,其对外政策行为屡屡遭遇麻烦与制约。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在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在经济上高度的相互依赖、共同的“跨国恐怖主义”敌人、国家迅速将经济财富转变成军事力量的困难等因素也鼓励有关大国在应对美国权力时,诉诸低成本的“软制衡”战略。

如何“软制衡”?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讲,大国“软制衡”美国的具体方式或案例主要包括:结成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中国与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特定的合

① 杨少华:前引文,第45页。

② 同上文。

③ 同上文。

作演习（如中俄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区域或国际机构中的战略协调与外交合作（如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针对美国的外交协作；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对伊拉克动武（2003 年）问题进行的协调，有限的军备建设（如欧盟逐步发展统一、独立的国防力量））等。下面主要以叙利亚危机为例，重点分析中、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软制衡”行为，即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协调与合作。

按照“软制衡”的行为逻辑，作为战略伙伴，中、俄两国在同美国的扩张主义有关的重要国际问题上进行意见交流与行动协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目前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在叙利亚危机中，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制衡并未采取加强军备或组建联盟的传统形式，而是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战略协调与外交合作对美国进行“软制衡”，但又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由于两国不具备直接挑战美国的硬件（军事和经济力量），因而只能通过间接地挑战美国的偏好和设置议程，以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对中国与俄罗斯来讲，“软制衡”是反对美国霸权和阻碍美国实现某些既定中东战略目标的重要外交战略。

（一）“软制衡”的表现

第一，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和俄罗斯一再使用否决权反对针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从谴责到严厉制裁或军事干涉的各种提案。2011 年 10 月，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法国、英国等国提交的有关制裁叙利亚的决议草案。2012 年 2 月，中、俄两国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要求阿萨德下台的决议又投了否决票。当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中、俄双方还对一份谴责叙利亚政权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同年 3 月，中、俄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份谴责叙利亚当局镇压平民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同年 7 月，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英国等国提交的关于对阿萨德政权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2014 年 5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有关决议草案举行投票，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投下否决票。这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第四次在安理会被否决。

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频繁地交换意见，密切协调两国对叙利亚问题的观点。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再重申“叙利亚的命运和未来应该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外部势力插手对于危

机的解决无济于事”的立场，反复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例如，2012年6月6日，中、俄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共同支持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的斡旋努力，叙利亚危机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寻求公正、和平解决。^① 再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8月20日表示“如果叙利亚政府对反政府武装人员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之后，中、俄双方领导人立即会晤，警告西方国家，两国反对针对叙利亚的任何单边行动。^②

（二）“软制衡”的原因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所以在叙利亚危机中对美国采取“软制衡”战略，除了前面提到的宏观上次等大国对美国霸权进行“软制衡”的几个因素外，还在于以下两个具体原因。

第一是相对强烈的制衡动机。尽管受限于制衡的实力门槛等因素，中、俄等大国对美国霸权的制衡强度远弱于多极体系或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制衡行为，但它们的制衡动机却相对较强。具体来讲，在叙利亚危机中，重大战略利益考量、良性认同和巨大的战略压力三大因素决定了中、俄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强烈动机。

其一是国家利益因素。叙利亚危机关系到中、俄两国的某些重大利益。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具有十分可观的经济、政治和战略价值。首先，叙利亚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俄罗斯在苏联地区以外唯一的军事基地便位于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塔尔图斯。^③ 其次，莫斯科支持巴沙尔政权部分是基于俄罗斯阻止西方国家过分侵犯别国主权的战略。叙利亚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后一个盟友。^④ 一旦失去叙利亚，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最后，莫斯科在叙利亚有着价值约200亿美元的重大经济利益，以及许多重要的军事协议和能源领域的大量投资。^⑤ 如果阿萨德政权倒台，俄

① 《中俄联合声明：叙利亚危机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寻求公正、和平解决》，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e_112138272.htm，2012-06-06。

②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53.

③ 顾志红：《中东动荡局势：俄罗斯的利益权衡与政策选择》，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65页。

④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50.

⑤ Ibid., p. 250.

罗斯很有可能将失去这些经济利益。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叙利亚不存在任何关键的军事和经济利益。例如，中、叙两国在 2010 年的双边贸易额为 24.8 亿美元，只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额的 0.08%。^① 同期，中国从叙利亚的进口额也仅为 4 000 万美元，且几乎都属于非石油和天然气产品。^②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主要是基于道义坚持和现实的考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有责任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得使用武力等二战后指导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中方认为，叙利亚问题理应由该国国内人民自主，且通过协调而不是武力方式加以解决。此外，叙利亚在中东位居地区战略要冲，如果阿萨德政权倒台，成为中东又一个政权更迭的国家，自然无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然，西方国家在利比亚问题上偷梁换柱、借设“禁飞区”保护平民之名、行武力推翻利政权之实的行为，亦是前车之鉴。因此，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应有地位的认可与尊重。

其二是良性认同。中、俄双方经过不断的认知调整与定位，相互认同度日益增高，不仅将彼此看作是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借重的重要力量，而且分享着某些共同观念。例如，中、俄对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着某些相似的看法：均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美国凭此促进其世界霸权利益；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强烈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倾向于借助地区或国际组织来加强本国在地区或全球的地位。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均把联合国安理会视作是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霸权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其三是巨大的战略压力。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恒久主题就是防范和遏制俄罗斯与中国。为此，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反恐战争、人权大棒、颜色革命与导弹部署等手段从多方面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通过干涉内政和强化传统同盟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打压，从而对中、俄两国的安全、政治生存、主权等核心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显著增大了中、俄面临的战略压力，降低了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增强了两国制衡美国霸权的动机。

^①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50.

^② *Ibid.*

这是因为：在霸权正当性的界定中，霸权国对主要大国核心利益的尊重或“照顾”是一条关键的原则。^① 一般来讲，最可能引发大国对抗甚至战争的是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或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侵犯。^② 在当前国际体系之下，从理论层面看，来自霸权国的压力越大，霸权正当性越低，体系内成员制衡霸权的动机越强。

因此，中俄联手采用“软制衡”战略，是一种利益的联盟、道义的联盟、反霸的联盟。

第二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有限性。尽管近年来中、俄已就一系列地区、全球议题确立了更为密切的战略合作，双方高层交往频繁，但两国关系仍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俄罗斯在扩展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方面始终表现得谨小慎微，担心未来本国军事工业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中国的竞争。同时，俄罗斯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也表示担忧。而且，中、俄两国在全球事务上也存在利益与目标上的分歧，并非毫无矛盾。相比之下，中国也远远比俄罗斯更加依赖西方市场。这从中国与美、俄两国的贸易流量的差异上便可见一斑。中国与美国在2011年的双边贸易额达5 000亿美元，而同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仅为835亿美元。^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何在许多重要的双边、多边问题上仍寻求美国的合作。此外，中、俄对现有国际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与功能的不同理解，也限制了两国结成排他性的非西方的正式联盟。鉴于此，中、俄虽具有制衡美国的强烈动机，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有限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方不能采用传统的制衡方式，而要采取新的制衡手段。

总之，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就叙利亚问题行使否决权本身属于典型的“软制衡”行为。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既给予双方在中东地区谋求本国利益的巨大行动自由，又便于两国协调彼此之间的预期。两国都把联合国看作是制衡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均视否决权是限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涉主义政策的一个良好机制。通过在安理会上联合行使否决权等外交合作，中、俄极力阻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涉或严厉制裁，努力拖延、阻挠和破坏它们针对叙利亚提出的种种决议草案或行动计

① 刘丰：前引书，第226页。

② 同上书。

③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48.

划^①。作为一种结果，这破坏了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和所谓“改造中东”的战略，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盟国中的信誉和影响力。“软制衡”这一理论分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好地分析大国行使否决权行为的理论框架。中、俄的这种“软制衡”行为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和质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中、俄的这种做法不能被视为是对当前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威胁或挑战，而只是中、俄给国际社会敲的一个警钟，即不要忽视两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利益。^②而且，鉴于实力上的差距和代价的巨大，两国尤其是中国仍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不过，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的行为，表明中国将会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通过这种“软制衡”行为，中、俄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两国在中东地区动荡以及外部势力应如何作为等问题上非常相似的立场。中、俄两国就中东问题的这种战略协调与外交合作，可能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发展，乃至演变成能够有效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更为牢固的一对战略伙伴。^③

综上所述，反对美国的“软制衡”已然开始，但这种“软制衡”的强度整体上还较弱，且未必会注定变成反对美国的“硬制衡”。这不仅在于国际体系在体系要素、互动属性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实力性质发生了改变，以及次等大国很难制衡美国的硬权力，还因为世界主要大国更关注的是美国政策的目的，而非美国的能力。而且，与小布什政府以单边主义为基调的安全战略不同，奥巴马的新战略更强调对多边主义的运用。当然，如前所述，奥巴马时期的这种战略调整并未导致美国凭借绝对优势追求绝对安全、实现一超独霸格局的战略本质的改变，美国也并没有彻底放弃单边主义。因此，只要美国大战略的本质不变，未从根本上摒弃单边主义，那么奥巴马主义很大程度上只是减弱了大国反对美国的“软制衡”强度，但最起码并不会导致“软制衡”在短期内消除。未来针对美国的这种“软制衡”强度能否进一步增大，乃至变成“硬制衡”，不仅取决于次等大国与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也依赖于美国霸权的正当性程度等诸多因素。尽管“软制衡”论在概念的精确性与理论的成熟度上尚存在不足，从而影响了该理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但至今为止尚没有哪种理论是毫无瑕疵的。理论源于并服务于现实，因而不可否

① Mordechai Chaziza, *op. cit.*, p. 249.

② *Ibid.*, p. 254.

③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op. cit.*, pp. 15 - 16.

认的是“软制衡”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解读当前大国行为、把握大国互动特征、判断次等大国应对美国霸权的行为倾向的新视角或相对熟悉的理论框架。

The Inherent Logic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ft Balancing” Theory

Xie Lichen & Qi Shujie

Abstract: The “Soft balancing”, as a variant of the traditional balancing ac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hard balancing” in strategic goal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echanism. There are mainly five reasons for second – ranked powers taking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namely unipolar structure stress and the power “threshold” of the balancing, the decline of US hegemonic legitimacy, the problem of hard balancing, the change of power characters, and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ternal elements and interactive properties.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nd diplomat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Syrian issue in the UNSC is the typical behavior of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Soft Balancing”; Great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Syria Crisi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